

# 《国语》研究

A Study of Guoyu

裴登峰◎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国语》研究

A Study of Guoyu

裴登峰◎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语》研究 / 裴登峰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97-5737-6

I. ①国… II. ①裴…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史籍②《国语》-研究 IV. ①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9848 号

## 《国语》研究

---

著 者 / 裴登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李建廷

责任编辑 / 宋淑洁 李建廷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10千字

版 次 /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737-6

定 价 / 108.00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先秦“语”书系统 .....	1
第一节 先秦“语”者主体 .....	1
第二节 先秦“语”体形态 .....	11
第二章 《国语》的“文”观念及“文德”理想 .....	26
第一节 “文”义演变与早期的“文德”意识 .....	26
第二节 《国语》“文”的内涵及“文德”追求 .....	31
第三章 《国语》的性质及地域“文化圈”特征 .....	46
第一节 《国语》材料性质辨析 .....	46
第二节 《国语》的地域“文化圈”特征 .....	67
第四章 《国语》故事化的特点 .....	96
第一节 《国语》故事的体制 .....	96
第二节 《国语》故事的“篇”“集”“群”构成形态 .....	121
第三节 《国语》故事的完整性 .....	123
第五章 《国语》的文学价值 .....	129
第一节 《国语》叙事的“互见法”艺术 .....	129
第二节 《国语》叙事的网状结构 .....	133
第三节 《国语》的人物群像 .....	135

第四节 《国语》的场面描写 .....	239
<b>第六章 《国语》的讲史及文化内涵 .....</b>	<b>256</b>
第一节 《国语》讲史的特点 .....	256
第二节 《国语》讲史的文化内涵 .....	261
<b>第七章 《国语》的思想 .....</b>	<b>273</b>
第一节 《国语》的教育理念 .....	273
第二节 《国语》的和谐理想 .....	284
第三节 《国语》的阴阳观念与生态平衡主张 .....	289
<b>第八章 《国语》征引典籍及作用 .....</b>	<b>294</b>
第一节 先秦著作中引用的典籍概览 .....	294
第二节 《国语》引经据典的文化内涵 .....	307
<b>附 录 .....</b>	<b>326</b>
战国五大“学术中心” .....	326
《战国策》文的自觉创作 .....	333
士人“精神胜利法”与《战国策》的娱乐性质 ——以拟托苏秦合纵、张仪连横《策》文为中心的观照 .....	364
《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文相关辞主问题考论 .....	380
<b>主要参考书目 .....</b>	<b>392</b>
<b>后 记 .....</b>	<b>395</b>

# 第一章

## 先秦“语”书系统

### 第一节 先秦“语”者主体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应该是先为口语文学，再为书面语文学，由口耳相传再到文字记录。“语”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人们讲述故事、传闻以及互相传递某些方面信息的一种重要形式。“语”在春秋及战国早期，流传颇广。先秦陈“语”者，主要有以下七种情况。

一为瞽、史<sup>①</sup>讲史。不可否认，在早期的文化活动中，“瞽”不仅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瞽”的主要职责为：占卜、乐师、讲史。<sup>②</sup>《国语·周语上》虢文公劝谏宣王云：

古者，太史顺时觐土，阳瘳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是日也，瞽帅音官以省风土。……廩于藉东南，钟

---

①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云：“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之所开也。”“学出于史，有明征矣。故一代之兴，即以史官司典籍。试观夏之亡也，太史终古去国；殷之亡也，辛甲抱器归周；周之衰也，老聃去周适秦。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在《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云：“盖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学术耳。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职所由尊也。”

② “瞽”在早期文学活动过程中，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有学者甚至指出：“最早的文学工作者，是用韵文记诵历史的巫师或瞽矇。”（王小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此说虽不完全准确，但说明了瞽矇与早期文学创作的一定关系。

而藏之，而时布之。

《周语下》提到“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瞽”也可为“瞽史”，但“史”（史官、讲述历史故事者）不一定为“瞽”。《诗经·大雅·灵台》云：“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鼙鼓逢逢，矇瞍奏公。”《诗经·周颂·有瞽》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虞，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鞀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周礼·春官》记载：“瞽矇掌播鼗……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太师。”之所以“瞽、史讲史”，是因为“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国语·楚语下》）的史鉴意识。《诗·大雅·烝民》强调：“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郑笺：“古训，先王之遗典也。”《逸周书·常训解》云：“夫民群居而无选，为政以始。始之以古，终之以古。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维今，法维古。”《程典解》云：“政失患作，作而无备，死亡不诫，诫在往事，备必慎。”《逸周书·史记解》记周穆王“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闻”。接下来记载左史为穆王讲述了二十几个国破君亡的历史故事，令人惊心。《国语》中关于要以史为鉴的论述，随处可见。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sup>①</sup> ——《周语上》

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久而无成。宣子欲攻之……叔向闻之，见宣子曰：“……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刑，而访咨于耆老而后行之。” ——《晋语八》

赵简子叹曰：“吾愿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对曰：“臣以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

<sup>①</sup> 韦昭注：“《周礼》，矇主弦歌讽诵。诵，谓箴谏之语也。”

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晋语九》

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楚语上》

灵王虐，白公子张骀谏。……对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义，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恶规谏者，不亦难乎？”——《楚语上》

“瞽、史教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知天道”。《周语下》云：

鲁成公见，言及晋难及郤犇之谮。单子曰：“君何患焉？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郤其当之乎！”鲁侯曰：“寡人惧不免于晋，今君曰将有乱，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祸者也。”

《国语·晋语四》引《瞽史之纪》云：“唐叔之世，将如商数。”又引《瞽史记》云：“嗣续其祖，如谷之滋，必有晋国。”这两条材料内容，更多地带有谶语预言色彩，正好反映的是“天道”——兴衰、祸福、治乱的历史规律。《晋语四》的“天道”和“人故”相对，更突出“人故”，“人故”促成了“天道”。这种认识是比较辩证、科学的。

在《国语》成书的过程中，瞽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起着多大的作用，依现有资料，难有断论。由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于是人们围绕这个说法不断讨论，却又得不出什么结论。虽然说司马迁写《史记》，态度非常认真，并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标准要求，要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是要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他把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到的庞杂材料，梳理成今天这个样子，委实不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史记》的材料，不一定是信史。这不是司马迁不



想求真，而是受材料缺乏的限制。《史记》里的记载，不仅有事实材料，还有传闻故事，甚至有合理的虚构与想象。<sup>①</sup> 因此在没有其他材料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就《国语》的作者，用《史记》里的这句话说明问题。因为这里的“左丘”是指一个人名，还是指一个姓左丘的盲人？此人是什么角色？为什么《国语》的形成与他直接相关？《论语·公冶长》里有“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之说。但司马迁所说的左丘明，与此为同一人还是不同的人？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无法得到证实，所以就没有必要在这个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上纠缠。更重要的一点是，《国语》并非个人的著作，而是经过长期流传，有人不断收集、编纂而成的，所以《国语》是集体创作的。但《史记》中的这句话，至少给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国语》的成书，与瞽史有关。“师箴，瞽赋，矇诵”，主要是讲前代箴言及历史。当然讲史者不一定是盲乐师，卿大夫、史官也会讲史。徐中舒云：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木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高度发展，但有关历史的传习也还未能脱离这样原始方式。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矇，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矇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所谓“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即史官所记录的简短的历史，如《春秋》之类，还要通过瞽矇以口头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语”从此成为一种新兴的书体，因此，记录孔子遗言就称为《论语》，记录古代传说就称为《说苑》，后来禅宗和理学有《语录》，小说有《话本》，皆以记录“语”“话”得名。管仲说：“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义无国不记。”《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及“教之语”之说，

① 就我国史传文学中的虚构表现手法而言，也许早期的人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想象，而是当真的。不管事实如何，但当时的人们，将许多今天看来是不可能的荒唐现象都视为事实，是相信的，甚至是深信不疑的。包括《尚书·金縢》的记载也是如此。“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在那个时代，这并不是人们的幻想，而是信以为真的。在观念的层面，与后代的虚构、想象不能同日而语。

“春秋”和“语”就是当时各国普遍存在的历史文献。<sup>①</sup>

但《国语》中的许多“语”者并非瞽、矇，“语”并非始自《国语》。《国语》中讲的是周王、诸侯王及卿大夫的活动，全与政事有关，且要说“官话”——与治国、秩序、伦理道德之类相关的言论。对于上层来说，在官场谈论政事很正常，从而形成了一种“语”场。

二为王者对大臣的命辞，及有些重要大臣（像周公、祭仲、芮良夫之类）在上层社会日常生活中谈论的“治国之善语”<sup>②</sup>“教诫之语”<sup>③</sup>“嘉言善语”<sup>④</sup>。《尚书》《逸周书》的许多篇目，即为此类性质。《逸周书·文传解》两引《夏箴》<sup>⑤</sup>，《逸周书·尝麦解》有成王箴大正之辞<sup>⑥</sup>，《逸周书》有周公诫成王之《大戒》，《大戴礼·武王践阼》言及周武王“退而为戒书”，都是具备上述性质的材料。《论语下》记载：“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犹绩，惧干季孙之怒也，其以歌为不能事主乎？’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耶？居，吾语女。’”接下来讲了“昔圣王”如何“处民”的一整套“古之制”“先王之训”。《国语·楚语上》还记载：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傲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賁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褻御之箴……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齐桓、晋文，皆非嗣也，还軫诸侯，不敢淫逸，心类

① 郑天挺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左传选》，徐中舒选注，中华书局，1985，第344~345页。

② 《楚语上》记载申叔时所列教育太子材料，其中就有“语”：“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韦昭注：“语，治国之善语。”《大学》引《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朱熹注：“《楚书》，楚语。”

③ 如《国语·鲁语下》：“季康子问于公父文伯之母……主亦有以语肥也。”韦昭注：“语，教诫也。”

④ 韦昭：《国语解叙》，载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第594页。

⑤ 其云：“《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

⑥ 其云：“钦之哉，诸正！敬功尔颂，审三节，无思民因顺。尔临狱无颇，正刑有掇。夫循乃德，式监不远。以有此人，保宁尔国，克戒尔服，世世是其不殆。维公咸若。”

德音，以德有国。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

其时有人收集此类内容。《周礼·夏官》云：“搏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之，使万民和说而正王面。”《周礼·夏官》有“训方氏”之职，曰：“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郑玄注：“道犹言也，为王说之四方诸侯也，上下君臣也。”“传道，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为王诵之，若今论圣德尧、舜之道矣！”《礼记·王制》云：“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天子齐戒受谏。”到汉代初年，汉高祖“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三为讲学之“语”。我国西周已开始对贵族子弟进行礼乐教育。《礼记·王制》记载了西周学宫的状况：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廱，诸侯曰頖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

《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在谈到教育太子的材料时，提到“教之春秋”<sup>①</sup>等。除了有组织的教育，另还有如孔子的“居，吾语汝”（《论语·阳货》），

<sup>①</sup> 《汉书·艺文志》的“春秋”观念，亦即“史”的观念，较为宽泛。鲁《春秋》及围绕传鲁《春秋》的为其中一组。另如“《世本》十五篇”，自注：“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奏事》二十篇”，自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至于《楚汉春秋》则有“演义”的性质。还有《国语》《新国语》，特别是《战国策》主要是纵横家之言，却列在“春秋家”。原因是如《史记·六国年表·序》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盛，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这里所说的“权变”，即《战国策》前身材料。亦即刘向《战国策叙录》所说的“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的“纵横短长之说”。

学生的“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之类口传心记的私人化讲授。

四为“庶人传语”（《国语·周语上》）。如《国语·周语上》云：“厉王虐，国人谤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韦昭注“庶人传语”云：“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达，传以语王也。”说明老百姓对朝廷之事会口口相传，评点是非曲直。《晋语五》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梁山崩，以传召伯宗，遇大车当道而覆，立而辟之，曰：“避传。”  
对曰：“传为速也，若俟吾避，则加迟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问其居，曰：“绛人也。”伯宗曰：“何闻？”曰：“梁山崩而以传召伯宗。”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宫廷里发生的事，会散布流传到民间。既然是口头流传，就会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变化。因为讲述故事者，为了引起听者的兴趣，往往会添枝加叶，越传越“闻”，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所以一般情况下，一个本来比较简单的故事，经过不同人的讲述，就会被不断地加工，故事也就会像滚雪球那样，情节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楚语上》还提出治国者要做到让“與人诵”，即老百姓对政事加以议论。《国语》中的一些材料，或许就是在“诵”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编纂而来的。《晋语六》记范文子云：

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谗言于市，辨祲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

该段文字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统治者要在市场上采听商贾传言，在歌谣中辨别吉凶，在道路上询问毁誉；“王者”“正德既成”，就要“听于民”，突出“听”。既然是“听”，另一方就要“讲话”，那么，就会有“使工诵谏

于朝”等形式。同时，该段文字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语”形成的原因，赖以生存的现实环境，以及内容上的历史感和现实针对性、实用性。范文子所说，最终归到一个“戒”字。这也说明了收集此类材料的动机。

五为人们缘于对历史遐想而生的传说，以及“好事者”为之的“齐东野人之语”（《孟子·万章上》），“请讲以所闻”（《庄子·德充符》）的逸闻故事。其中三皇五帝传说为重要的内容。先秦两汉典籍，记载此类传说的内容很丰富。历史传说以《尚书·尧典》《舜典》所记载的尧、舜传说最为典型。另外如《荀子·儒效》《韩非子·十过》《吕氏春秋·古乐》以及《顺民》《本味》等都有大量历史故事的记载。<sup>①</sup>《荀子·非相》云：“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

① 《庄子·盗跖》云：“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

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索隐》云：“《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也。”“言《帝德》《帝系》所有表见者皆不为虚妄也。”“言古典残缺有年载，故曰‘有间’。然帝黄遗事散轶，乃时时旁见于他记说，即《帝德》《帝系》等说也。故已今采案而备论黄帝已来事耳。”<sup>①</sup>另外如《礼记·乐记》的“牧野之语”<sup>②</sup>为历史故事，是叙事文体。除此外，当时朝野还流行内容芜杂的传说故事。《墨子·非命中》云：“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流言传语乎？”《庄子·盗跖》云：“此上世之所传，下世之所语。”此类“语”“说”内容主要分为：一是历史传说；二是民间故事，甚至奇闻异事。如《墨子·公孟》所引“鲁语”中四弟劝长子葬父为民间传说故事<sup>③</sup>，《明鬼》引述诸国《春秋》记载为奇闻异事。这些故事传达出的是警戒、教训意义，如不能妄杀无辜，不能不敬慎祭祀。对“著在齐之春秋”的齐君杀诉讼者后祭祀之事，孙诒让注云：“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诛也。”<sup>④</sup>另外还有现实人物故事，如列子、孔子之类。

六为“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周礼·春官·大司

①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之司马贞《索隐》，中华书局，1985，第46~47页。

② 其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

③ 其云：“鲁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长子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与我葬，当为子沽酒。’劝于善言而葬，已葬而责酒于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岂独吾父哉？子不葬，则人将笑子，故劝子葬也。’”

④ 《墨子·名鬼下》云：“今执无鬼者言曰：‘夫天下之为闻见鬼神之物者，不可胜计也。亦孰为闻见鬼神有无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众之所同见，与众之所同闻，则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弔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为君者以教其臣，为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愆也！’”

乐》)。“意思说在教养下一代年轻人的正式场合,采用‘乐语’的形式,是以掌握‘兴’以下的各种形态的话语为目标的。这种‘语’乃是宫廷瞽史们所秉持的教养工具,向青年人加以传授的则是由众多瞽史们传承下来的那些规诫性故事。”<sup>①</sup>

七为德才兼备的贤者之“语”。《晋语六》“赵文子冠,见栾武子”中有九个人分别训导赵文子之“语”。另外,“宫廷之外,在各个乡村共同体举行乡饮酒礼和射礼等公共活动场合上,青年人们向前来参加活动的老人求‘语’,这就构成了老人们教训话语的‘语场’。孔子一门在向弟子们进行教育时,采用这种‘语’的形式,也是继承前面所说的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的方式。在《礼记·乐记》《论语·阳货》篇等处看到的‘居,吾语汝(女)’这一固定的表现形式正证明了此点”<sup>②</sup>。“关于在乡党社会中存在有‘语’的场所的实情,《仪礼·乡射礼》篇中有‘古者于旅也语’句可做参证。其意为:在乡里举行射礼之后的酒宴上,当饮酒仪式过半,开始进行‘旅酬’(按次序劝卿大夫饮酒)时,就要谈论‘语’了。此外,《礼记·文王世子》篇中也有如下说法:

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

在中国古代,当人们聚集在一起举行饮酒礼等活动时,要召请老人们入席,举行‘养老’仪式。在这个所谓‘养老’的仪式上,人们不仅仅是在公共行事中款待老人,献给他们丰盛的食物。其实在这种场合,人们聚集起来听老人们所讲的‘语’,才是召请他们的主要目的。”<sup>③</sup>

① 小南一郎转引贝冢茂树的推测,见小南一郎《论小说的起源:从“语”到“说”》,《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② 小南一郎转引贝冢茂树的推测,见小南一郎《论小说的起源:从“语”到“说”》,《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③ 小南一郎:《论小说的起源:从“语”到“说”》,《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高祖传》十三篇”,班固自注:“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这说明“述古语”传统沿袭自汉高祖时。在郑天挺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左传选》的“后序”所附徐中舒《春秋时代的瞽史》一文中所述的一段话,可(转下页注)

## 第二节 先秦“语”体形态

先秦“语”体有主流，如《国语·楚语上》申叔时提到的应该是教育贵胄的教科书的“语”，《国语》中的《周语》《鲁语》之类。还有非主流，如《尹文子·大道》引“语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憎。”“语曰：‘禄薄者不可与经乱，赏轻者不可与人难。’”另外还有大量引用的“俚语”“鄙语”“野语”“谚语”<sup>①</sup>。除了这些，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其“学百家之术”。这“百家之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靠“语”来完成的。《范雎列传》载范雎言：“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已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是恶能困我而夺我位乎。”这里提到的“百家之说”，也在“语”的

（接上页注③）以帮助我们联系遥远过去民众的一些活动。其云：“最近《文物》月刊载李家瑞同志记云南几个民族记事表意的方法，对于我们理解春秋时代历史文献的传习，富有启示意义。他在此文中记述卡佉族传述本村历史方法说：‘卡佉族（西盟）有一种传代木刻，也是记事性质的木刻。他们在每年第一次吃新米的时候，要召集全村老小一齐尝新，由年老的人口头传述本村历史，就拿出历代相传的一根木刻。木刻两侧都刻着许多刻口。每刻口代表着一桩事件，刻口深的，表示重大事件；浅小的表示事件轻小。有时新发生一桩事件，也照样加刻上一个刻口。讲述的老人主要是指示给族人某一刻口是记本村的某事和某村人结下仇怨，已经报复过或未报复过，其意义是要族人记着仇怨不忘报复而已。而村中其他事件也借这个机会，口耳相传延续下去。’从这里，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木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高度发展，但有关历史的传习也还未能脱离这样原始方式。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矇，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矇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所谓‘史不失书，瞽不失诵’，即史官所记录的简短的历史，如《春秋》之类，还要通过瞽矇以口头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所不同于卡佉族者，仅以专职的瞽矇作为长老的分工，而以简短的记录代替木刻。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郑天挺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左传选》，徐中舒选注，中华书局，1985，第343~344页）

① 与“语”意思接近又有点不同的是“言”。从内容方面看，二者大体相同。从篇幅和体制而言，“语”与“言”均为格言、警句，都是短小的句式。但“语”有时是长篇大论，“言”则没有这种情况。“言”有时也许是格言、警句的集锦。如《老子》第四十一章：“故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颡。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高亨认为：“‘建言’殆老子所称书名也。《庄子·人间世篇》引法言，《鶡冠子·天权篇》引逸言，《鬼谷子·谋篇》引阴言，《汉书·艺文志》有谏言（班自注不知作者），可证名书曰言，古人之通例也。”（转引自辛战军《老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第166页）



范畴之内。《李斯列传》记载李斯给秦始皇上书云：“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其建议“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滑稽列传》载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太史公自序》言其“整齐百家杂语”。诸如此类均非主流。我们这里不讨论“语”的非主流形式，而要讨论“语”的主流形式。我们认为“语”的主流形式，主要有以下这些。

《尚书》。该书虽不以“语”名，但实际内容主要为“语”。为何有《尚书》之类典籍？因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汉书·艺文志》），且“君举必书”（《国语·鲁语上》），加之“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义，无国不记”（《左传·僖公七年》）。《礼记·玉藻》言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记·晋世家》载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汉书·艺文志》则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是否为“左史”或“右史”所记，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尚书》为“语”体系统文献。当然《尚书》应该不是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而是在包括了史官之类许多人讲述的基础上，又有人不断收集、积累起来的相关材料的汇编。编辑此类材料的目的，主要在于“史鉴”作用。

《国语》。文献记载有三种本子。即《汉书·艺文志》著录“《国语》二十一篇”。自注：“左丘明。”还有“《新国语》五十四篇”。自注：“刘向分《国语》。”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认为：“本旧有《国语》而分之，故曰《新国语》，即重新编定之书也。”《晋书·束皙传》记载，汲冢魏墓出土“《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后两种已散佚。陈梦家认为汲冢《国语》，“大约与今所传《国语》相类，然其内容不同”。<sup>①</sup>对此，我们可以做三种情况的推测：一是有人谈论晋、楚事；二是记载楚、晋之事的“言”“事”相间的形式；三是纯客观地以叙述的形式，记载楚、晋事。另外，先秦“记”“志”之类，性质有与“语”接近者。如《汉书·艺文志》著录“《记》百

<sup>①</sup> 陈梦家：《六国纪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30页。